



强手调查

本报首席调查记者 王金强

文化是文化人的通行证,迂腐是保守者的墓志铭。一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运河古村——吕家庄,曾经文化昌盛兴旺发达,在运河断流后的迷惘中,却固守耕读,失去了发展的机遇。

“社区化”的脚步声正步步逼近,这座有文化底蕴的村庄名称行将消失。或许,文人辈出的村庄,以史为鉴让后人创造新的历史,是他们600年来首次“写史”文化觉醒。



随波而逝的十二连窑故址拆下来的城砖今仍残存。 王金强 摄

一座运河古村 找回600年历史

回到自己的历史里

入夏的天气时而溽热,时而阴郁聒噪,已经70多岁的刘金忠选择到家附近的董子文化街内的一间办公室内“上班”。

屋内的桌子上多了外地寄来的报纸资料,以及跟运河文化相关的各种研讨会、采访邀请。6月开始,陆续有来自天津、济南和扬州的访客,来拜访刘金忠。

随着大运河申遗成功,循着运河的徒步寻访、挖掘运河沿岸风情的团体越来越多,这

位年过七旬一个月前还在医院靠吊瓶恢复身体的老学者,成为各路寻访团登门拜访的对象。

索性,刘金忠就天天到这间别人借给他的办公室内坐班,一方面再重新梳理梳理运河文化,一方面也能免去访客经常找不到他家门牌的尴尬。

多年来,刘金忠致力于描写德州风物人文,对“卫运河流域文化”有深刻而独到的研究。“也就是最近,关于运河文化的

事情来找我的人才多了起来,前阵子都来邀请我写村志的。”刘金忠说,每写一次村志,他总会有种痛心感。

好多村志的撰写,是在村名即将消失,村史无从考据的情况下,去梳理并写成的。作为一种补救之术,村民试图在村志里留住一丝黄土砖屋的记忆,供乡亲们追思先先生存居住的痕迹。

只是没想到,这种事情还是发生在自己身上——今年

年初,武城县四女寺镇吕家庄村书记找刘金忠,原来他老家所在地吕家庄很快就没了,村民盼望他能出山,给这座600年历史的村庄撰写第一部村志。

时隔数年,刘金忠和弟弟再度回到村里走访,跟全村人一起回忆曾经走过的岁月。“记录下自己的历史,记录自己的文化,记录自己的情感!”刘金忠写下这句话,表达着自己对故土的情感。

以史为鉴 走好今后的路

“以史为鉴,启迪未来”。历史是公平的,让刘金忠欣慰的历史闪光点总会有。一如在极左路线步步紧逼的严峻的日子里,有一户普通村民,给自己的孙辈命名为:儒、仁、孔、孟、礼、义、珍……通过珍重那些应该珍重的,充分地表达了吕家庄人对于文化的崇尚和对于破坏文化行为的不屑。

历史上的吕家庄,百姓以经营农事为主业,以读书上进为进取之阶,耕读兴业、人丁兴旺、民风醇厚、和睦相处、读书向学成风,在四乡素享“文化村”的盛誉。

经过不断地梳理,吕家庄重视学校教育的历史,也得到证实——该村早在民国年间即办了私塾,由村中“秀才”张子实先生任教,全村最早一批识字并有所作为者,多为这个教师之学生,以后更是从教成风。吕家庄所出教师数量,大大高于周围村庄之平均数。

吕家庄人对于本村小学中来自外村的教师的尊重,是可圈可点的。多年前,李福彬老师在本村教书,每年春节后,各家轮流请老师到自家吃饭,直到出去正月,老师都不用自己开伙做饭。谁家请到老师来家吃饭了,这家的学生会欢欢喜喜、十分光彩。

另外,人们把文化村的表现,还理解为这个村外出工作的村民中,进入政府机关、银行,从军入伍或到天津从事餐饮服务业的人众多,而鲜有“闯关东”从事农业者。

吕家庄是一个有特殊代表性的村庄,一个非常典型的文化样本点。在她的身上,带着从农耕村落形成的几乎全部特征。优点和缺点、高尚与低卑;善良与偏狭、希冀与失望;卓识与蒙昧、尊崇与屈辱……

刘金忠说,这里很快因为社区合并,连名字都将消逝在历史长河中。这座有着600年历史的小村庄,终于有了第一部村志,这就是自己的“正史”,历史兴替,都将启迪每位村民,延续传统走好今后的路。

(本文受访者刘金忠对此文亦有贡献)

没有吕姓的吕家庄

平整的泥巴墙,用油布纸封着的木头窗户,一块块平铺的火砖地基,还有透着岁月流逝特有的斑驳绿色……走进吕家庄,除了村里的水泥路透着新的气息,处处可见上个世纪才有的风貌。

路边乘凉的村民自称这里是“吕庄子”(俗称),大多数是从山西洪洞移民而来。上世纪五十年代,约为百户之聚、五百口人。村中凡六姓,依人数多少排序,分别为刘、赵、张、郭、周、

李,却鲜有吕姓。

在村中,流传着原系德州城中吕家街财主家的佃户村这种说法。刘金忠认为,证实证伪,均没有什么根据。

即便如此,刘金忠还是多方挖掘了该村的历史文化因子——“高鸡古泊”。隋大业九年,竇建德使其党孙安祖入高鸡泊为群盗。后高士达据以起事……今夷为平陆矣。原来,这里是推翻隋朝的三大农民起义之一的竇建德起义的发祥地。

从吕家庄往南,地处吕家庄村南的一片大洼,正是“高鸡古泊”所在。为了证实这段历史,刘金忠苦苦寻觅,终于在《中国地名大辞典》中找到相关记载。近年,在这片大洼里,距吕家庄数里之处,发现、发掘了起义领袖孙安祖的墓地,证明了上述记载的可靠性。

在吕家庄村东一里处,原有“十二连窑”,是为北京城和故宫烧制城砖的官办窑场。所

谓“北京的城,德州的土”,就指的这里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,这些窑址还大体完整地屹立原处,而且仍能使用。一九六三年,根据当时汛情,国家决定在吕家庄迤东、四女寺迤西的“银钉扣”堤段“破堤分洪”,滚滚波涛恰从十二连窑故址汹涌而出,这才最后消灭了十二连窑的痕迹。迄今在村中的老屋墙基上,仍有大量从窑壁上拆下来的城砖残存。

小村庄见证大时代

吕家庄地濒运河南岸,吕庄东与四女寺相距二里。大运河堤岸恰如一个椅子圈,将村庄围住。京杭大运河的贯通,带来了南来北往的各种文化交融,也造就了吕家庄人见多识广、敢作敢为的性格特点。

因背依运河大堤,村庄和土地相当集中,全村拥有二十四顷土地,是每一个吕家庄父老为之自豪的事情。然而,一九五八年“大跃进”运动时期,原本属于这个村的财产被“调”给

另一个村,吕家庄丰厚的土地资源,被侵占、折损过半。

再加上运河改道造成的土地流失到彼岸,造成今天吕家庄土地未足一千三百亩的困窘之局。在那个年代,吕家庄割舍的,不仅仅是土地,还有文化觉醒。

让刘金忠痛心的是,随后的吕家庄人进入了随波逐流的怪圈。“文革”后的改革开放初期,或许是运河的断流,让吕家庄人懵然中找不到突破口……

一九九二年,因为胜利油田勘探大队在吕家庄田野上打井,触动了一部分人的私欲,引发了一起哄抢油田器材的案件,受到公安部门重视,引起民心涣散,经济秩序混乱不堪。竟然出现了连续三年提留无人交、义务工无人出,土地荒芜300余亩无人种,各项工作陷于瘫痪的可悲局面。

此后,在社会步入商品经济的阶段,吕家庄也没有表现出自己的创造性。除去村民郭丰明靠在外承揽工程取得一定

成功外,武城县诸多农民发了大财的“玻璃钢”生产,以及稍后的汽车配件生产、密封条生产等都没有被吕家庄乡亲们吸收过来。

“十二连窑”随波而逝,沃土在“大跃进”中被折损,运河断流后的文化失落,经济形势的日新月异却没有找准方向,空有文化积淀却死死抱着“耕读为本”的老皇历守田园,再也没有富裕起来……刘金忠都客观甚至批判地记录下这段历史。